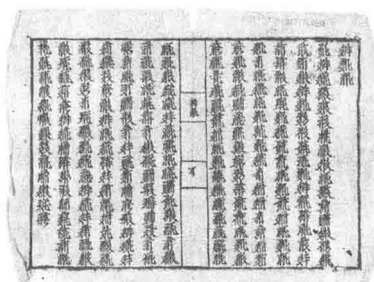


北方民族大學學術文庫

西夏佛經序跋譯注

聶鴻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夏佛經序跋譯注 / 聶鴻音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25-8030-9

I. ①西… II. ①聶… III. ①佛經—序跋—研究—西夏 IV. ①B9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55528 號

西夏佛經序跋譯注

聶鴻音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惠敦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8.75 插頁 2 字數 204,000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030-9

K · 2183 定價: 42.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導 言

本書從存世的西夏文獻裏搜集佛經的序跋並加以翻譯和注釋，目的是為中國文學史和佛教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完整的基礎素材，同時為有志學習和鑽研西夏語文的朋友提供一份實用的閱讀資料，而著者自己則希望藉此來實踐一種模擬西夏文學風格的翻譯手法。

這裏所謂“西夏佛經序跋”指的是西夏時代（1038—1227）帝后臣民在編印或散施佛經時寫下的短文，包括“序”、“跋”、“後序”、“願文”、“題記”等，一般附在相關佛經的卷首或卷尾一併流行。這些作品或者用西夏文寫成，或者用漢文寫成，共同構成了西夏文學中一個獨特的類別。考慮到當今很少有人能够直接閱讀西夏文字，所以我們對西夏文的序跋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解說，並以此作為本書的主體部分。用漢文寫成的作品相對易懂，我們就不再加以注釋，祇是把它們匯集起來，放在書末作為“附錄”，以方便讀者從總體上體會西夏的文學風格。

研究史的回顧

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估計，佛教在西夏的普及程度不亞於同時代的中原和吐蕃，由此而產生的佛教文學作品似應不在少數。不過到 19 世紀末為止，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已幾乎亡佚殆盡，沒有人能夠想像出它們曾經享有怎樣的一段輝煌。

事實上，晚清時代仍然傳世的西夏佛經序跋祇有一篇，即大

臣賀宗壽在命人編成《密咒圓因往生集》後用漢文寫下的序言。1897年，波茲季涅耶夫從明刊本《大藏經》裏輯錄出了這部作品並針對其中的八思巴字進行了詳細研究，但由於他的成果祇是發表在一部關於蒙古歷史文獻的油印教材裏，^①所以並未引起人們的足夠注意。^②

在1900年的“庚子之亂”中，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等三人來到了北京北海的白塔下，從一堆廢棄的舊書裏找到了六冊西夏文的《妙法蓮華經》。^③據毛利瑟後來說，其中第一冊的卷首有一篇未知的序言，可能是西夏時代的，也可能是1420年明成祖御製的，^④不過遺憾的是，這冊書連同其他兩冊一起被賣給了柏林的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20世紀40年代前後又轉到了波蘭的雅蓋隆圖書館(Biblioteka Jagiellońska)，至今未獲刊佈，^⑤毛利瑟的猜測自然也無從證實。

作為西夏學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科茲洛夫(П.К. Козлов)率領俄國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隊於1908年和1909年兩次來到

① A. M. Позднеев, *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897, с. 209.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收藏有這份教材的原件。

② 《密咒圓因往生集》的這篇序言後來被羅福頤輯入《西夏文存》(七經堪校印本, 1935)第19—20葉，始為西夏學界週知。

③ 見伯希和(P. Pelliot)為聶歷山《西夏研究小史》寫的評論, *T'oung Pao*, vol. 29 (1932), pp. 226—229.

④ M. G. Morisse, *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re} Série, tome XI, II^e partie (1904).

⑤ 另外三冊《法華經》收藏在法國的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據我所見，其中卷八的末尾有兩行殘損非常嚴重的題跋，內容已經不能通讀。有理由估計這幾冊西夏文《法華經》是明代抄本，卷尾的題跋也應該是明代寫下的。

內蒙古額濟納旗的黑水城遺址進行發掘，最終在一座古塔內獲得了難以數計的西夏文獻，現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在這些資料裏，佛教著作的西夏文譯本佔了九成以上，^① 本書輯錄的佛經序跋大都出自其中。不過，20 世紀上半葉的人們還不能熟練地識讀西夏文字，所以當時能夠鑒定出的僅限於本書“附錄”裏那些用漢文寫成的作品。

黑水城所出西夏佛經序跋的發表始於 1911 年。在那一年裏，伊鳳閣公佈了漢文《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的施經發願文，並且寫下了一些注釋。^② 應該承認，研究初期的少數注釋不能令人滿意，例如他把佛弟子“阿逸多”解釋成了“釋迦牟尼彌勒佛”，又把夏仁宗尊號“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悖睦懿恭”裏的“顯道”解釋成了“西夏第三代統治者（1032—1049）的年號”。文章刊出的當年，沙畹（E. Chavannes）在《通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來匡正伊鳳閣的疏失，^③ 不過這篇評論自身也並非全然無可指摘，例如其中把《金剛經》和《普賢行願經》誤會成了一部實際並不存在的“金剛普賢行願經”，並試圖勘同不空所譯《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經》。除此之外，沙畹的錄文裏還出現了多處句讀錯誤，令人感到無奈。^④

大約一年後，伯希和赴聖彼得堡瀏覽了黑水城所出的漢文

① 關於這些文獻的詳細情況，參看 E.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② А. И. Иванов, Страница изъ истории Си-ся, *Известі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іи Наукъ*, VI серия, томъ V (1911)。

③ T'oung Pao, vol. 12 (1911), pp. 441—446。

④ 這篇文章後來被羅福頤以《施經發願文》為題輯入《西夏文存》（七經堪校印本，1935）第 20 葉，並題“此文書於《彌勒上生兜率天經》之末，乃俄人柯智洛夫氏訪古黑水所得諸經之一”。

文獻，在這過程中他注意到了其中有西夏帝后的款題，還有一些西夏時代的刊印後記，包括天慶二年（1195）皇太后羅氏的《轉女身經發願文》。^①然而可能是出於專業興趣的緣故，歐洲學者並沒有對佛經序跋表現出太大的關注。事實上除了弗魯格對羅太后《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發願文》、仁宗《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後序》和《佛說大乘三歸依經後序》做過簡介之外，^②成堆的資料長期不見有人理會。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4年纔得以改觀——俄羅斯漢學家孟列夫編成了一本《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③在描述俄羅斯所藏全部漢文書籍的同時幾乎也把每篇序跋都著錄其中，書末還附有少量圖版，令學者按圖索驥毫無困難。當然，如果能夠提供序跋的全文，肯定會有利於讀者對書籍的性質形成更深層次的印象。^④

與漢文序跋相比，西夏文序跋的公佈就滯後了許多。在20世紀上半葉，祇有羅福苕抄錄發表過一篇不署年代的《妙法蓮華

① Paul Pelliot, *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és par la mission Kozlov*, *Journal Asiatique*, Mai-Juin, 1914.

② К. Флуг, По поводу кита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изданных в Си С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 вып. 2—4, 1932. 應該指出的是，弗魯格由於粗心而犯了一個錯誤——他把《佛說大乘三歸依經》的譯者沙門德慧誤認作後序的作者了。《佛說大乘三歸依經後序》的作者其實是夏仁宗仁孝。關於仁宗《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後序》，另參看 Е.И. Кычано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с. 236.

③ Л.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хот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4. 有王克孝中譯本，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

④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書後附有孟列夫、蔣維崧、白濱新編的《敘錄》66頁，對漢文文獻和序跋的詳細考證盡在其中。

經序》並進行了試解，^①不過限於當時的文字識讀水平，其中的西夏字錄文不夠準確，夏漢文字對譯也不盡合理。1970年，日本語言學家西田龍雄造訪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民族博物館(Etnografiska Museet)，見到了探險家伯格曼(F. Bergman)在中國西北地區獲得的西夏文佛經殘片，這些殘片都出自元刊本“河西字大藏經”的首函，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篇《大白高國新譯三藏聖教序》。西田先生抄錄了這篇序言，後來伴隨着相應的解讀發表在他的名著《西夏文華嚴經》裏。^②大概由於翻譯的目的語是日語而非漢語，所以西田先生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西夏語法的成規，轉以追求譯文的通暢易懂為要義，而這也正是其譯文優於前人的關鍵原因。

1988年，中國西夏學家史金波首次嘗試對當時他所能見到的西夏碑碣銘文、佛經序跋、發願文和石窟題記進行匯編。^③他的《西夏佛教史略》共輯錄了這方面的資料37種，其中有西夏時代的漢文序跋20種，西夏文序跋4種。^④漢文序跋是史先生於前一年訪問俄羅斯時在孟列夫“敘錄”指引下據原始文獻抄錄的，四篇西夏文作品中的《妙法蓮華經序》來自羅福萇錄文，《大白高國新譯三藏聖教序》來自西田龍雄錄文，《慈悲道場懺法序》和《金光明最勝王經發願文》則是史先生本人在北京和

① 羅福萇《妙法蓮華契經序釋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1930（1932年出刊）。文章所據原始文獻的照片大概是聶歷山（Н.А. Невский）提供給羅氏的。俄藏《妙法蓮華經》的原件照片在70年後得以發表，見西田龍雄《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寫真版》，IOS RAS·Soka Gakkai, 2005。

② 西田龍雄《西夏譯經雜記》，《西夏文華嚴經》第2冊，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6，頁5—7。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頁230—333。

④ 另有《金光明經流傳序》等四種，均為蒙元至明代作品，不屬本書討論範圍。

西安查訪所得。毫無疑問，首次發表俄藏漢文佛經序跋的全文是《西夏佛教史略》的重大功績，^①而未能披露任何一件俄藏西夏文佛經序跋的內容卻不能不說是該書永久的遺憾。

黑水城文獻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屬於特藏文物，閱覽手續比較複雜，加之史先生當初在俄的時間倉卒，所以不能指望做出纖毫無誤的錄文。^②以仁宗皇帝御製的《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並勝相頂尊總持後序願文》和羅太后的《轉女身經發願文》為例，這兩篇作品在俄國各存有兩個印本，不知為什麼史先生僅抄錄了其中的殘本（TK. 164、TK. 13），^③卻沒有採用那兩個相對完整的本子（TK. 165、TK. 12），由此不但導致逐錄的文字缺失，而且還在錄文的相應地方出現了斷句錯誤。另外，史先生在翻譯那幾篇西夏文的序跋時也未能给出足够的語文學和文獻學注釋，使讀者難以確知他之所以這樣處理譯文的理由。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應該說，在 20 世紀的最後十年間，《西夏佛教史略》在本研究領域中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1999 年，俄羅斯傑出的西夏學家克恰諾夫在日本京都發表了他的巨著《西夏文佛教文獻目錄》，^④展示了俄羅斯科學院東

① 附帶說，中國的文獻學界有時尚缺乏關注出土文獻和國內外研究成果的習慣。例如在西夏時代的漢文佛經序跋絕大多數都已刊佈的情況下，許明編著的《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卻祇收集到了一篇《密咒圓因往生集序》（頁 1015），這當然是不應該的。

② 史先生《西夏佛教史略》中的錄文錯字曾由宗舜法師逐一為之指出，參看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佛教題跋匯編》（《敦煌學研究》第 3 輯，首爾：首爾出版社，2007）的注釋部分。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頁 270—271、275。

④ E.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方文獻研究所黑水城特藏中已經考定的西夏文佛教文獻的全貌。書中詳細描述了每一個編號的版本形制和現存內容，著錄了文獻的作者、譯者、校訂者、施主和抄寫人的姓名，對佛經序跋的簡介也散見其中。憑藉克恰諾夫的這部著作，人們可以很方便地輯錄出一份俄藏西夏佛經序跋的目錄，從而到近九千個編號的黑水城特藏裏把所需的資料查找出來。不過，由於著作中沒有提供序跋的全文，尤其是在很多地方甚至沒有給出首尾款題的西夏文形式，而僅僅代之以俄文的翻譯或者注音，這往往令研究者感到他們關注的一些問題在書裏找不到最終的答案。人們更為期待的顯然是儘快公佈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全部照片。^①

事實上，在克恰諾夫《西夏文佛教文獻目錄》正式發表之前的1993年，大規模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的計劃就已經啟動。這項計劃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現在的東方文獻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現在的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實施，目的是以圖版形式整體刊佈俄國黑水城特藏中的漢文文獻和西夏文世俗文獻，以及有選擇地刊佈西夏文佛教文獻。近20年來，計劃中的漢文文獻和西夏文世俗文獻已經出版完畢，^②西夏文佛教文獻

① 早在1973年，格林斯蒂德就曾編過一套九卷本的《西夏文大藏經》（Eric Grinstead: *The Tangut Tripitaka*, 9 vols,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73），刊佈了中國和俄國收藏的一批西夏文獻，這套書的編輯質量差強人意，且中國沒有一個圖書館購買，因此在國內沒能產生預期的影響。

②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1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13。

的出版也已經開始。^① 儘管距離全部資料的刊佈仍然遙遠,但值得稱道的是,借助這個計劃,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蔣維崧、嚴克勤二位先生已經將大量西夏原始文獻拍攝回國,這批為學界企盼已久的資料很快便在中國引發了西夏文獻整理研究的新一輪高潮。^②

進入 21 世紀以後,中國學術界不再滿足於對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進行膚淺的介紹和空泛的禮贊,而逐漸轉向對具體文獻和文化現象的細緻考察。在這種新的趨勢下,不斷公佈和開放的原始文獻為學者提供了廣闊的探索空間。就西夏文的佛經序跋而言,近年來以錄文形式刊佈的有《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並勝相頂尊總持後序願文》、^③《佛說父母恩重經發願文》、^④《佛說阿

①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15—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012。

②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開始出版之後，又有一大批海內外收藏的西夏文獻得以刊佈，相關的出版物計有：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編《英藏黑水城文獻》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10；寧夏社會科學院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甘肅五涼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編《中國藏西夏文獻》20 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2007；武宇林、荒川慎太郎主編《日本藏西夏文文獻》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不過這些著作能為我們提供的西夏佛經序跋資料不多。

③ 段玉泉《西夏文〈自在大悲心、勝相頂尊後序發願文〉研究》，《寧夏社會科學》2007 年第 5 期。

④ 聶鴻音《論西夏本〈佛說父母恩重經〉》，載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編《文獻研究》第 1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彌陀經後序願文》、^①《無垢淨光總持後序》、^②《聖大乘三歸依經後序願文》、^③《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施經發願文》、^④《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後序願文》、^⑤《拔濟苦難陀羅尼經發願文》、^⑥《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題記》、^⑦漢文序跋經過重新研究的則有《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御制後序》、^⑧《佛說父母恩重經發願文》。^⑨值得指出的是，近年對西夏文獻的解讀已經基本擺脫了當初佶屈聱牙的“逐字硬譯”模式，以追求漢譯文的準確、流暢為目標，甚至嘗試再現原作的文學風格，這很可能會成為今後一段時期的主流。顯然，在現有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參考來自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文獻照片，^⑩最終為西夏佛經序跋編錄一本總集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
- ① 聶鴻音《西夏文〈阿彌陀經發願文〉考釋》，《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 ② 聶鴻音《西夏文〈無垢淨光總持後序〉考釋》，《蘭州學刊》2009年第7期。
- ③ 孫伯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譯釋》，《蘭州學刊》2009年第7期。
- ④ 聶鴻音《乾祐二十年〈彌勒上生經御製發願文〉的夏漢對勘研究》，載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4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
- ⑤ 聶鴻音《〈仁王經〉的西夏譯本》，《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 ⑥ 聶鴻音《俄藏西夏本〈拔濟苦難陀羅尼經〉考釋》，載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⑦ 孫伯君《黑水城出土〈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譯釋》，載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4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
- ⑧ 聶鴻音《黑水城所出〈般若心經〉德慧譯本述略》，載甘肅省藏學研究所編《安多研究》第1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 ⑨ 聶鴻音《論西夏本〈佛說父母恩重經〉》，載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編《文獻研究》第1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 ⑩ 另有些資料經過初步整理，散見聶鴻音《西夏遺文錄》，載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2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西夏的譯經和禮佛

佛教在西夏國建立之前就傳入了党項地區，祇是具體時間和途徑已經無從查考。^①現存史料所載党項人最早的禮佛活動見於《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上》，時間是 1007 年：

（宋景德四年）罔氏薨……及葬，請修供五臺山十寺。

從 11 世紀 30 年代到 70 年代，西夏曾經不止一次地向北宋王朝求購整部的大藏經，^②同時陸續着手把漢文的佛經譯成西夏文。西夏桓宗皇帝御製的《大白高國新譯三藏聖教序》裏面有“曩者風帝發起（敕准）譯經”一句話，顯示出由皇室發起的譯經活動始於“風帝”（景宗元昊）在位期間（1036—1048）。^③西夏覆亡將近一個世紀後，党項遺民在《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裏追溯了這段歷史：

-
- ① 不能排除党項人最初從吐蕃人那裏得知佛教的可能性，參看 Ruth Dunnell, *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 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p. 75—77。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西夏語的“如來”、“經”、“論”這幾個最基本的詞並非來自漢語，而是分別來自藏語的 De-bzhin-gshegs-pa、mdo-sde 和 sde-snod-ma-mo。參看聶鴻音《西夏佛教術語的來源》，《固原師專學報》2002 年第 2 期。
- ② 西夏的“贖經”活動據史金波統計共有六次（《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頁 59—62），但他依據的有些資料原始來源不明，恐非北宋時代的實錄，所以實際的次數也許沒有那麼多。
- ③ 西田龍雄直接把“風帝”譯成“李帝”，是考慮到党項首領接受的北宋王朝賜姓“李”。見西田龍雄《西夏譯經雜記》，《西夏文華嚴經》第 2 冊，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6，頁 6。

又千七年，漢地熙寧年間，夏國風帝興法明道圖新。戊寅年間令國師白法信，承道年又令臣智光等先後三十二人為首，譯為番語。民安元年，五十三載，其中先後成大小三乘半滿教及不見著錄者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①

遺憾的是，現存的西夏文佛經中沒有一部可以確定為早年景宗、毅宗兩朝的譯作，^② 我們無從得知元昊發起譯經的具體情況，甚至不知道最初的譯經活動是出自元昊本人的敕命還是由別人發起後再得到元昊支持的。然而取西夏時代的相關記載對比一下我們卻能明顯感到，元朝人對歷史的追溯恐非全可相信。例如西夏文佛經序跋中最為著名的《妙法蓮華經序》裏說：^③

-
- ① 聶鴻音《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中的兩個年號》，《固原師專學報》2004年第5期。這裏“熙寧”的翻譯採用了孫伯君的意見。這篇發願文是史金波首次研究的，他的譯文如下：“重千七年，漢國賢者？歲中夏國風帝新起興禮式德。戊寅年中，國師白法信及後稟德歲臣智光等，先後三十二人為頭，令依番譯。民安元年，五十三歲，國中先後大小三乘半滿教及傳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見史金波《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譯證》，《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 ② 現存注明年代最早的文獻是夏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刻本《佛說阿彌陀經》（俄藏 инв. № 4773），參看 З.И.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 20。
- ③ “導言”部分中凡引用本書譯注的序跋均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風角城皇帝以本國語言，建立番禮，創製文字，翻譯契經，武功特出，德行殊勝，治理民庶，無可比擬。前朝譯經眾多，此《蓮華經》未在譯中。

惠宗秉常(1068—1086在位)的西夏文《慈悲道場懺法序》裏說：

朕今憐念，慈憫有情故，乃開道場，延僧傳譯眾經，其中此《懺法》者，於諸經率先選出。

毫無疑問，如果說西夏早期在半個多世紀的官方譯經活動中譯出的佛經有812部之多，甚至連“不見著錄者”都收錄了進去，而其中竟然遺漏了世人皆知的《妙法蓮華經》和《慈悲道場懺法》這兩部頭等重要的著作，那是令人絕對難以置信的。對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解釋，即元昊時代儘管開設了譯場，但並沒有從政府角度對譯經工作做出具體指令，至少是當時的譯經僧並沒有嚴格依據“開寶藏”那樣的整部藏經把其中的經文依次譯成西夏文。^①換言之，西夏早期的譯場固然在組織形式上或稱完善，^②但其業務工作卻像是缺乏整體設計的無序行為。12世紀中葉以後出現了由仁宗皇帝具名新譯和校譯的大量佛經，^③但這似乎祇能說明前代的佛經翻譯工作並不完善，卻不足以證明西夏文“大藏經”的結集在那時已趨告竣。顯然，

① 《大白高國新譯三藏聖教序》裏所說的“白子經本不豐，未成御事，功德不具”可能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② 關於西夏的譯場組織，參看史金波《〈西夏譯經圖〉解》，《文獻》1979年第1期。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頁79—82。

如果要說西夏時代編印過整套的西夏文“大藏經”，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根據目前的資料我們寧可相信，真正意義上的西夏文大藏經結集和刊印祇是在元代纔首次完成的。^①

然而，西夏君臣的功德記錄卻屢次提到人們在禮佛儀式中閱讀了各種文字的“大藏經”。例如賀宗壽的西夏文《拔濟苦難陀羅尼經發願文》有“念誦番、漢、西番三藏契經各一遍”，呱呱的漢文《父母恩重經發願文》有“開闡番漢大藏經各一遍，西番大藏經五遍”，似乎表明當時確有完整的“番大藏經”（西夏文大藏經）存在。不過我們僅憑常識就可以判斷，在幾天時間內念誦完成三千餘卷的“大藏經”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西夏人的“大藏經”定義顯然不同於唐朝《一切經音義》中的“一切經”，因為至少我們知道“西番大藏經”（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在那時還沒有正式結集。^②現在比較穩妥的假定是，西夏時代所謂“大藏經”祇是那以前翻譯的眾多釋典的泛稱，並非依照統一體例編成並依照統一規格刊印的佛教作品總集，而“念誦番、漢、西番三藏契經各一遍”，其實際意思也僅僅是“宣讀了三種文字的許多佛經”。至於皇太后羅氏在西夏文《施大藏經牌記》裏說的“新增寫番大藏經一整藏”，則不過意味着她命人抄寫了某個皇家寺院收藏的全部零散佛經而已。^③

① 聶歷山、石濱純太郎《西夏語譯大藏經考》，原載《龍谷大學論叢》287（1929）。周一良譯文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1930。

② 一般認為藏文大藏經的首次結集是13世紀中葉在日喀則附近的納塘寺進行的，參看王堯《藏傳佛教譯經史料鉤沉》，《中國藏學》1992年第3期。另外，目前也沒有證據表明西夏刊印過漢文的《大藏經》，參看李際寧《關於“西夏刊漢文版大藏經”》，《文獻》2000年第1期。

③ 令人費解的是，在世界各地收藏的西夏文獻中至今沒有發現某個寺院的藏經目錄，而這類目錄在敦煌文獻中卻很多見。

無論是中原還是西藏，從開始翻譯佛經到《大藏經》的正式結集都經歷了數百年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人們致力於翻譯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尋訪到的佛典梵文原本或者其他語言的譯本，祇是在自己語言的譯本積累到相當大的數量時纔會產生按照統一體例編纂《大藏經》的念頭。^①毫無疑問，12世紀末的西夏已經出現了“大藏經”的概念，但我們還不能確切知道那究竟是已然實施的行動還是泛泛的理想。^②不過無論如何，西夏王朝畢竟在30年後亡於蒙古，而這個理想至少是在半個多世紀後由元代的西夏遺民實現了。

一般認為西夏前期接受的是漢傳佛教，^③12世紀中葉以後則增加了藏傳佛教的成分。^④現有證據表明藏傳佛教在西夏的普及程度始終沒有超過漢傳佛教，因為我們看到，不但存世西夏文藏傳佛教著作的數量遠遠少於漢傳，而且譯自藏文的著作大多數都是由實際譯者署名，而不像許多譯自漢文的西夏文著作那樣，題署西夏帝后“御譯”或者“御校”。還有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西夏文的《五部經》是從藏文翻譯的，然而我們看到，序言作者的漢文化和藏文化素養似乎都不很高，甚至對佛教的基本

① 另一個可用以對照的事實是，元大德年間（1297—1307）翻譯並刊印的蒙古文大藏經和清乾隆年間（1736—1795）翻譯並刊印的滿文大藏經其實都是不完整的。

② 羅太后在《施大藏經牌記》裏說她命人“新增寫番大藏經一整藏”，這至少暗示我們在西夏晚期還沒有“番大藏經”的雕版存在，否則就不必命人抄寫。

③ 索羅寧最近注意到，西夏漢傳佛教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契丹，參看所著《道殿〈鏡心錄〉西夏譯本初探》，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5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這無疑是一個值得認可的事實。

④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頁50—51。